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100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探索历程与独特优势

肖翔，苏煦阳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产业数字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与新中国成立76年来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水平极端落后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赶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足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情，积极把握数字经济特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产业数字化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具有独特优势：总揽全局，前瞻把握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数字化的堵点与难点；统筹兼顾，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至上，探索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同共进的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产业数字化；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1-0014-09

Trajectory and Superiority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AO Xiang, SU Xuya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a rol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nation's 76-year journe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PRC's establishment, starting from a position of extreme industrial backwardn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y leveraging the strength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historical conditions, steered the nation to achieve a dual catch-up in bo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China has leveraged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ing country, actively aligned with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orged a path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driving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uch distinct strengths as overseeing the broader picture to set its strategic direction, mobilizing concentrated resources to tackle key bottlenecks and challenges, coordinating all related aspects to address emerging issue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uphold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to harmoniz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well-being.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 historical trajectory

收稿日期：2025-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1BDJ111）

作者简介：肖翔，男，湖南新邵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2][24]}。产业数字化强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中心和新一代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和数字化升级、转型、再造；其不仅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数字化，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一方面可以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产业间融合发展^[3]，延伸产业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将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多样化产品供给和异质性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如何把握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历史契机，也成为当前世界强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工业价值链战略，都将目光聚焦于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强国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的背景下，加快推进我国产业数字化，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5][20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产业数字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推动了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数字技术由信息技术演变而来^[6]，新时代中国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76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密切相关。本文拟从更长的时段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探索历程，以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为占领数字经济大国竞争制高点提供历史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历史基础

虽然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是1996年由唐·塔普

斯科特（Don Tapscott）首次明确提出，但是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技术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兴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信息化起步的基础十分薄弱。在资本、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赶超，还不断缩小与世界强国信息化、数字化的差距，为新时代产业数字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早期探索（1949—1978）

电子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1946年，世界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由于近代中国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新中国成立之后，亟需完成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补课。在工业化水平极为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前沿，积极探索电子信息技术，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日后实现信息化、数字化赶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积极部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人才、设备、工业基础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西方国家的封锁更给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阻碍。但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组织相关力量积极探索电子信息技术。1956年，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将电子计算机列为选定的六个重点项目之一。在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科学规划委员会还制定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前瞻性布局，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其二，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实现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关键突破。毛泽东对组织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作出了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批示。第二机械工业部电信工业局与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底合作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建委员会。在“先

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当时十分有限的人力、财力资源，独立自主地取得了信息技术的重要突破。1958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的诞生，1959年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的诞生，填补了我国计算机领域的空白。

其三，军工电子产业率先发展。电子工业是信息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发展对技术要求较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电子工业率先在军事领域取得突破。1950年我国成立了电信工业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自行设计和制造了71型和81型等通信装备。“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电子工业占了10项，均属于军工企业^[7]。从1965年到1980年，通过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我国在四川、贵州等三线地区兴建了一批电子工业基地，为改革开放以后电子工业的赶超发展奠定了生产基础^[8]。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电子信息技术的早期探索，不仅有助于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积累的技术、人才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信息化赶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信息技术革新较快，受当时历史条件局限，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面临的赶超任务仍旧艰巨。

（二）中国共产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加速发展（1979—2000）

演化经济学家佩雷丝曾指出，“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9]。信息技术具有创新速度快、通用性广、渗透性强等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邓小平同志敏锐指出：“没有电子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10][30]}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突出强调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引领作用，为我国日后的产业数字化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基础上，1983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到2000年电子工业总产值力争比1980年翻三番，主要产品和生产技术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的总目标。1985年，中共中央在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机械电子工业担负着装备国民经济

各部门的使命，必须在技术改造上先行一步”^[11]。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把电子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4年，国务院制定的《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进一步明确了电子工业要以微电子为基础，以通信、计算机等新兴信息产业为主体，加快现代化的步伐^[12]。电子信息产业支柱产业地位的确立，推动了其快速发展，为我国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打下了产业基础。

第二，注重前沿技术的追踪与突破。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特点，中国共产党重视前沿技术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信息技术成为该计划7个亟需突破的高技术领域之一。同时，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作为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重点，指出“要组织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高技术研究”^[13]。199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信息技术是“973”计划的重点领域。“973”计划有力支撑了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第三，形成“市场调节逐步加强，以民为主”的发展模式。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要以民养军，电子工业也应如此”^{[10][245]}。1979年4月，中央提出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电子工业部改由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归口管理，在管理体制上由军口转向了民口，从而使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实现了从“以军为主”到“军民结合”再到“以民为主”的战略转变。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的改革与调整，推动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我国还将部分部属电子工业企业下放至地方政府管理。由于电子工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电子工业发展，将其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这一时期，民营经济的兴起也促进了电子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兴办了一大批电子工业企业，形成了新的生产基地，推动了电子工业规模的扩张。

（三）中国共产党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探索（2000—201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了信息化进程，信息化在世界范围内进发

出强大的活力。新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立足当时我国工业化尚处于中期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战略，为日后产业数字化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注重信息化对国民经济整体提升的作用。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1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信息化融入工业化进程，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15]。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16]进入新世纪，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都存在较大的赶超压力，而世界发达国家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又让中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之路，探索发挥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引领作用，走出了一条信息时代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把握信息时代技术与产业发展新趋势。新世纪以来，数字经济时代悄然来临。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前瞻性地对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提前规划与布局。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将“数字化和智能化设计制造”作为重点领域，并且强调了要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17][982]}。中国共产党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提前布局，为我国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例如，智能制造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和创新集成，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攻方向，当时对于已完成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强国而言也尚在探索阶段。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处于中期阶段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全球信息技术革新的前沿趋势，积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数字化必须以强大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信息基础设施不仅对技术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量大、建

设周期长、通用性强，具有军民共用的性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积极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18]；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17][982]}。信息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为信息化、数字化提供了强大硬件支持。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实践探索（2012—）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和商机”^{[19][106]}。在信息化基础上，数字化重视整合信息时代分散在不同系统里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价值。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升级与技术更迭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一方面由于存在“数字鸿沟”，产业数字化可能加剧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把握技术机会窗口，则可以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弯道超车”。加快产业数字化成为当前世界大国竞争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工业化、信息化领域的赶超，不仅奠定了雄厚的科技与产业基础，而且形成了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景等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数字化也进入快车道，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

在当前传统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削弱、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复苏乏力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充分激发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潜力与发展活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信息化作为“新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习近平指出，“要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21]。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方

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产业数字化，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2]796}。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3]。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加快实现转型升级^[24]。数字经济凭借其在信息搜寻、复制、运输、追踪与验证等方面低成本优势^[25]，能够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为激发制造业大国的发展活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关键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文件，从国家层面对产业数字化进行了具体战略部署。例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26]。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产业数字化进入快车道。2016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17.4万亿元，2022年上升为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1.7%，占GDP比重为33.9%，2023年继续增长到43.84万亿元^[27-29]。

（二）对产业数字化的重要领域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安排

首先，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突破。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强调“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神经网络芯片等关系长远发展的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要从国家层面超前谋划布局”^{[19]108,115}。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时，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进行了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对核心技术领域进行提前布局与顶层设计，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提供了重要保障。其次，将智能制造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点。习近平强调，“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

级”^[30]。针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将智能制造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突破口，积极以增量带动存量，不断激活制造业大国的活力与潜力。截至2022年，我国已实施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和420个新模式应用项目，建成700余个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培育超6000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28]。“十四五”时期已经累计建成23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1260家5G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31]。再次，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新基建提供的“硬环境”。习近平强调，“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5]197}。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时强调，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32]；在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时也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22]796}。2022年12月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建设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33]。“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2]21}。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数字基建实现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产业数字化提供了良好的“硬基础”。例如，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开通5G基站231.2万个，占全球总量的60%^[34]；截至2025年6月底，我国5G基站总数达455万个，行政村通5G比例超过90%^[35]。5G以卓越的无线接入能力，满足了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智能感知、泛在连接、实时分析和精准控制等需求，推动生产自动化、操作集中化、管理精准化和运维远程化^[3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还发挥强大的协调能力，推动以“东数西算”为代表的跨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整合各区域比较优势，拓展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空间。

（三）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优势，推动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领域有很多原创性的重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导航等，都直接或间接出自政府之手，后来通过市场应用

逐步做大^{[19][17]}。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一批核心数字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发挥市场在产业数字化中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普遍缩短，研发与制造的界限日益模糊，驱动创新范式由线性创新体系往创新生态系统阶段转变。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不仅在应用领域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营造数字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从消费互联网时代向工业互联网时代升级，一批制造业大企业在政府支持下主导建立了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产业数字化提供了重要硬件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还要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20]}。我国引导中小企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纷纷“上云上平台”，打破了企业的“数据孤岛”，实现了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有机融合。例如，山东济南在全国率先出台《济南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市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元激励企业上云，全市上云企业数量突破5万家^[29]。在政府扶持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大大降低，其依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激发创新活力，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更好地分享“数字红利”。政府与市场的有机互动形成了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强大合力。

（四）重视克服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安全、数字垄断以及冲击就业等矛盾

从全球发展实践看，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赋能与放大效应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可能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衍生出新的矛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注重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首先，坚持底线思维，保障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经济安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独立自主，还对产业数字化进程中衍生的数字安全问题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控制系统与互联网连接，传统相对封闭的工业生产环境将被打破。例如，钢铁、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涉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重要敏感数据泄密，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还将

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19][95]}，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37]。2019年，工信部联合九部门印发了《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基本建成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覆盖近14万家工业企业、165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38]。其次，注重规制数字垄断。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特征，存在大企业“赢者通吃”的现象。例如，一些兴起于消费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开始进入制造业领域，其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垄断风险。习近平提出，“一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野蛮生长、缺乏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5][302]}。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十五五”规划则强调，要完善监管，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2][24]}。中国共产党对数字垄断的规制为产业数字化创造了公平发展环境。再次，避免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过度冲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39]。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对传统产业形成包括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挤出效应^[40]；另一方面，其也将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习近平强调，“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19][2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采取积极措施以避免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冲击；通过构建数字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劳动者数字素质。同时，我国还出台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大力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培育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五）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为产业数字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为我国产业数字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与联通性，可能进一步强化先进技术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家层面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另一方面，许多

发展中国家数字基建落后，可能强化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马太效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设数字“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强调，要“连接成二十一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习近平还提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9][62,171]}。在2021年举行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上，中国提出《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倡议》。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与西方国家主导开放模式中隐含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分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利用中国企业在数字技术、人才、资本和转型发展方面的经验和优势，逐步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互惠共生的良性发展模式。例如，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与东盟加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的合作。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产业数字化的独特优势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2]5,20}。产业数字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从当前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一方面，由于产业数字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前瞻性地投入与规划；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需要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等具有较强外溢性的基础条件支持，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产业数字化都呈现出国家干预主义的特点。新中国成立76年来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推动产业数字化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必将为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弯道超车”注入强大动力。

（一）总揽全局，准确把握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世界科技与产业发

展前沿，对涉及中华民族重大利益的技术、产业适度超前布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面临“一穷二白”的艰难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依然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信息技术前沿领域谋篇布局，为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奠定了初步基础。新时代，在中国工业处于工业2.0与工业3.0并存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产业数字化的大方向，积极占领工业4.0时代的制高点。党对于产业数字化方向的前瞻把握，克服了市场主体的短视局限，为中国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契机提供了重要指导。其次，长期执政地位让中国共产党得以对产业数字化进行科学规划。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一方面通过重大科技战略部署，“一张蓝图绘到底”，对信息技术前沿进行长期规划与部署；另一方面，通过若干五年计划（规划），扎实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对信息技术的中长期科学规划，不仅有效克服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失灵”，而且避免了西方执政党更替带来的“政府失灵”，有效推动了发展中大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开拓创新的政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前沿，不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坚持立足人口大国、制造大国的国情，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努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数字化道路。

（二）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数字化的堵点与难点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虽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迈向高水平的重要引擎，但其发展本身也是世界科技的前沿与难点。这不仅导致相关技术难以直接引进，而且从全球范围看，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也仍处于探索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在加强前沿领域政府投入，《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承诺5年内投入约2500亿美元用于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关键科技研究领域^[41]。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竞争中

的作用更为凸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围绕重大目标，汇聚政府、企业、高校与研究院所等多元力量，明确数字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及优先序列，推动关键底层技术取得新突破，扭转工业软件、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通过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牵引产业数字化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是高水平实现产业数字化的关键，但新基建对资金与技术的要求较高。中国共产党汇聚全国力量，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多层面的有机互动，有效推动新基建高水平发展。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全国一盘棋”的优势，推动跨区域新基建建设，加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之间的算力、数据合作，发挥大国内部的优势互补，推动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

（三）统筹兼顾，解决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与新挑战，对于这些问题与挑战，目前国际上尚无成熟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有效克服了这些发展中的矛盾与弊端。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产业数字化所带来的数据安全、系统风险等问题已超出单一市场主体的应对能力，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作为后发大国，若在核心数字技术上长期依赖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将面临潜在的数据主权与安全风险。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同时，通过完善法治体系、组织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系统构建起数字安全屏障。此外，数字技术本身兼具高门槛与强渗透性，容易使已在技术、资源上占优势的地区和企业进一步放大优势，加剧“马太效应”，拉大发展差距。对此，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统筹协调的优势，着力消弭数字鸿沟，促进区域间、企业间的协同合作，确保“数字红利”为更广泛的主体所共享。

（四）人民至上，探索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同共进的道路

从世界经验来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该如何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成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强调资本至上、强化资本在经济分配中的强势地位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产业数字化过程

中，立足人口大国国情，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运用“共享”新理念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有效遏制了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抑制了其盲目逐利带来的消极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着力提升劳动者的数字技能与素养，开拓产业数字化背景下的就业与创业新空间，从而规避“技术陷阱”对人民福祉的潜在冲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人民至上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2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正逐步探索出一条产业数字化与人民福祉协同共进的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 [N]. 人民日报, 2023-09-24(4).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5.
- [3] 洪银兴, 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2): 5-16.
- [4] 祝合良, 王春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 理论与对策 [J]. 财贸经济, 2021, 42(3): 14-27.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6] 史丹. 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11): 26-42.
- [7] 董志凯. 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156项建设研究 [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 396.
- [8] 李彩华. 三线建设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4: 65.
- [9] 卡萝塔·佩蕾丝.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 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M]. 田方萌, 胡叶青, 刘然, 等译. 孟捷, 李蓉, 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808.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756.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8.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377.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17.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8.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070.
- [1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 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6.
-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习近平经 济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1.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30.
- [24] 详解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N]. 人民日报， 2023-12-18(4).
- [25]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1): 3-43.
-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N]. 人民日报，2023-02-28(1).
- [2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EB/OL]. [2025-09-2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 [2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EB/OL]. [2025-09-2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P020240326636461423455.pdf>.
- [2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EB/OL]. [2025-09-2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北京：外文 出版社，2020：247.
- [31] 加快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N]. 人民日报，2025- 10-25(5).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94-795.
- [3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 年）》[N]. 人民日报，2022-12-15(1).
- [34] 徐向梅.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驶入快车道[N]. 经济日报， 2023-02-24(11).
- [35] 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人 [N]. 人民日报，2025-07- 22(1).
- [36] 陈左宁. 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2021—202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1, 35, 36.
- [37]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总体 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2022：118.
- [38] 徐恒.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N]. 中国 电子报，2022-09-16(2).
- [3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09.
- [40] 洪银兴，韩绿艺. 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就业优先的困境 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J]. 教 学与研究，2022(6): 32-41.
- [41] 项梦曦. 全球芯片短缺困局如何破解 [J]. 金融时报， 2022-02-10(8).

责任编辑：徐海燕